

◎创作谈

# 文学现场的魅力与挑战

——《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与我的文学批评

孟繁华

《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2016-2021的文学状况》，是我在春风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一本文学评论集。这本书除个别文章外，大多写于2016年至2021年，涉及文学理论、文学史、小说评论以及对重要文学期刊的评论，因此起了这个名字。这是我2018年出版十卷本《孟繁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后的第三本文学评论集，此前两本分别是《文学的草场与星空》和《散文的气质》。

我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至今已有40余年。40余年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当代文学现场，可能因为这份顽固的执着，被洪子诚老师说成是“我的”当代文学。这里有洪老师的幽默，也一定有他的不以为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序言中，我曾写道：“我们不必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代，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然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其中更多还是自我安慰的成分。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对当下的文学状况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或多或少源于对文学理想化的想象，那个理想化又多指向五四时期或上世纪80年代。事实上，理想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即便是五四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也是在历史叙事和经典化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当下文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现实生活的原因，任何作家都难以超越时代和生活的制约和限制；有的则是作家对生活的认知和文学才能的问题。文学批评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我看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文学批评的巨大进步是主流；我们在了解和熟悉了西方文学及理论的前提下，正在努力构建本土的文学经验和批评话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基本事实。这是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认识。

就我个人来说，我满怀激情地从事这个工作。我曾经也有过犹豫

和矛盾，特别是看到很多朋友成功“跨界”和“转型”，有了另一番天地。我羡慕他们并非也曾跃跃欲试，但总是难以付诸实践。我迟迟下不了决心，犹犹豫豫地在“进与退”的边缘上徘徊，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对文学批评怀有情感而难以放弃。其实，这些属于个人的选择不值一提，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能够有一件事伴随自己已非常幸运。从事文学批评以来，我陆续出版了30余本著作，有部分专著，更多是当下作品的评论集。当下的文学创作就是文学现场，这是一个巨大的场域，任何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难以将其穷尽。这一方面给我们透彻地观察文学现场带来难以克服的挑战，一方面也为我们的批评活动提供了无穷的资源。这对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此，不断提高个人理论修养和艺术感受能力，是一生的功课。

我40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著作凤毛麟角。勉强可以提及的大概是1997年出版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化变化的著作《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其实这本书我前只写了3个多月，期间还要处理很多其他工作和事务。但那个热气腾腾的年代，常常让我激动不已、激情难抑。北京的大街小巷洋溢着一种方向明确、万众一心的乐观和浪漫主义气息。我每天到天桥邮局购买多种报纸和杂志，各种文化现象此起彼伏扑面而来，我被这种时代文化气氛深深感染，很快就写出了书稿并出版。出版后引起了一定反响，国内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中国日报》向国外介绍、报道了出版情况，法国、日本等媒体也做了介绍和报道。200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值得一提的是，《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2002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首批项目，出版了英文版，之后又出版了日文版、法文版、越南文版。我对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思潮论”“现场



孟繁华

郭红松绘

论”和“作品论”六卷本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我之所以说这些，不是说我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有多么重要，而是说这个经历给我极大的鼓舞和快乐。有时我想，那些曾经花费了巨大精力的著作，比如《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1978：激情岁月》《传媒与文化领导权》等，只在学界的某个领域里有些许反响，而像《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这样一本通俗的学术著作却在国内外引起更大反响，不仅让我深感幸运，其中更有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学者从事研究活动，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时代，关注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切，这应该是我们从事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现实的一切都和我们有关，更与大众有关。我们身处其间，时代的氛围、文学的新变、接受的环境等，我们有切身体验的优势，这是后来人难以体会的；同时，我们也必然有局限，我们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而天马行空。这就是文学现场的“魅力与挑战”。

几十年的文学批评和研究经历，让我有机会目睹中国文学的巨大进步。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有个口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那时我们缺乏起码的文学自信，我们期望中国文学能够得到世界的承认，进入文学世界的“联合国”；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被世界各国

喜欢、热爱的中国作家不胜枚举。中国作家为世界带来了中国想象、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这个巨变是历史性的。我们应该怀有极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从事我们的文学活动。在这样的文学时代从事文学批评，我备感荣幸。当然，文学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挑战一方面来自文学的接受环境。在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越来越丰富的今天，文学阅读被极大地分流了，今天的读者可以在其他文化消费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未必一定要阅读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短视频等，极大地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和消费实践；科技发展不断，人工智能写作已不是传说。虽然我坚信作用于人类精神和情感领域的文学是人工智能永远替代不了的，它只能对大众文化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地吸引部分人群，从而分散对文学的阅读——尽管它不会改变文学存在的大势。

回望来时路，我感谢作为良师益友的谢冕和洪子诚两位老师：他们一个激情澎湃如唐诗，一个温婉沉稳如宋词。他们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时间越久，越觉得两位先生的可敬可爱和可亲。他们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榜样。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这友谊除了情投意合，最终还是与文学有关。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新作评介

## 书写山乡巨变『贵州故事』

——评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

王彪

欧阳黔森的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以小见大，聚焦贵州武陵山腹地紫云镇三个典型贫困村千年村、花开村、红岩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镇党委书记龙险峰与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带领基层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乡村振兴之路。小说为贵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留下了历史剪影，也为乡土文学书写贡献了时代新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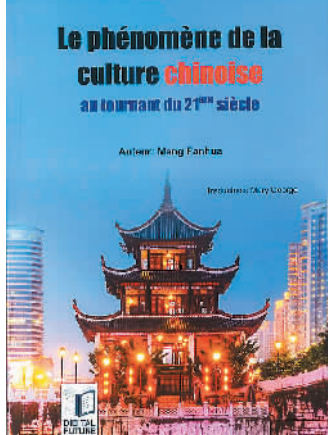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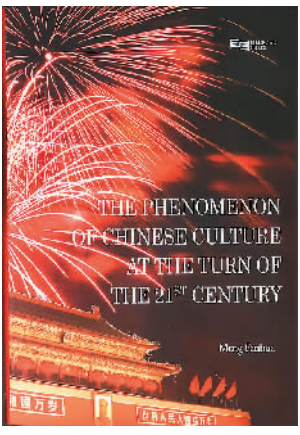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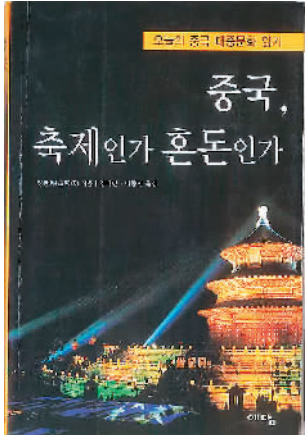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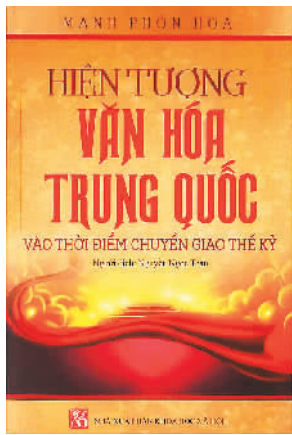
欧阳黔森在大量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贵州贫困地区的集中书写是其近年来文艺创作的发力点。不论是小说《八棵苞谷》《村长唐三草》《绝地逢生》、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还是影视剧《绝地逢生》《花繁叶茂》，都显示出作者书写人民史诗的努力。新作《莫道君行早》中，欧阳黔森通过典型呈现、文体融合、接续传统等手段，展现山乡巨变“贵州故事”，为乡土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接续与新变留下了典型样本。

《莫道君行早》是欧阳黔森在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基础上进行跨文体实践的新结晶。《江山如此多娇》中“眼见为实”的调研访谈与客观准确的事实数据为《莫道君行早》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素材与考察视域。基于此，欧阳黔森腾挪转移、上砖架梁，虚构了一个更为立体丰满的小说世界。首先，作者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新时代黔东南武陵山腹地紫云镇，并将贵州精准扶贫的差异性经验通过镇辖的三个典型贫困村予以全景式呈现。其次，作者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群像。镇党委书记龙险峰、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是称职负责的当代干部形象；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花开村支书石松涛、红岩村支书潘宏梁是性格迥异又勇挑重担的基层干部代表；牛老五、林小薇、孔先刚则是底层困难群众中的典型。最后，作者将故事置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封矿”“三改”“发展乡村旅游”等环环相扣的情节冲突中展开。于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愈发显得动人心魄。

《莫道君行早》是欧阳黔森将既往创作中地方性叙事、传奇性叙事与地域知识叙事等艺术经验熔铸一炉、综合运用的新尝试。凭着对武陵山脉、乌蒙山脉的独特地域书写而闻名的欧阳黔森，深谙地方性叙事对一个作家创作的意义。新作中的地方元素并非意在风景展览或猎奇装饰，而是作为人物塑造的大背景与叙事的潜在推手而存在。作者对武陵山腹地“美丽但极度贫困”的揭示，对黔地农民坚韧狡黠又坚韧实干的描写以及引述方志对此地丹砂文化、佛道文化、傩戏文化的介绍，不仅为小说镀上浓厚的地方色彩，更暗含了精准扶贫、开发乡村旅游等情节设定的底层逻辑。传奇性叙事主要表现在传记式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中最传神的是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麻五皮。《莫道君行早》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麻五皮传》，这个狡黠幽默又实干担当，还有点话痨的形象，正是从作者意在“为民间野性人物立传”的小说《村长唐三草》中生发出来的。小说中的地质知识叙事主要起辅助作用，如镇党委书记龙险峰对三个典型贫困村地质地貌的熟稔，增添了人物的丰满度；驻村书记肖百合面对几百年地质活动的神奇构造所表现出的震

撼，为物行动提供了情感支撑。从《莫道君行早》中，可以看到作者自觉继承了周立波《山乡巨变》的乡土文学传统。《山乡巨变》中，自上而下的女性外来者视角、阶级矛盾的淡化处理、乡村风景和日常生活的呈现以及民间歌谣传说的化用，使其成为最具乡土气息的农村题材小说之一。回到新作《莫道君行早》，我们看到在描写脱贫攻坚从个体单干走向团结合作的过程中，无论是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自上而下的女性外来者视角，还是以幽默戏谑化解矛盾的情节处理方式，或是对黔东乡村风土人情的描摹，都可见欧阳黔森向前辈周立波的致敬。当然，作为诞生在新时代的作品，小说显露出的新质更不容忽视。人物形象上，《莫道君行早》塑造了一批生动立体的农民、基层干部、个体经营者、知识精英等农村新人群像；观照视角上，小说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精准捕捉到了贵州精准扶贫的时代脉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作者将地域性的史传、方志与民间歌谣、传说融入叙事，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增强了文学表现力。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小说的标题取自毛泽东《清平乐·会昌》，隐含著作家欧阳黔森对“行走”的信仰。乌蒙山脉、武陵山脉的腹地，处处留下了欧阳黔森探访新时代乡村的脚印，这也使得他能用艺术化的手法生动描绘出贵州脱贫攻坚、山乡巨变的大美画卷。（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由左至右分别为《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越南文、韩文、英文、法文、日文版本。

## 评论界关注昆明作家群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近年来，一批云南籍作家引发文坛关注，他们以带有民族和地域色彩的文字，为当下中国版图增添了一抹亮色。4月3日，由中国作协昆明分会、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从西南崛起——昆明作家群北京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多位学者和评论家对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的创作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点评。学者、评论家与作家充分互动，彰显了创作与评论的双向赋能。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致辞中说，6位昆明作家是从西南崛起的云南作家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庆国的创作体量丰厚而庞大，是一位“贯穿式”的实力派作家；半夏关注山川风物、鱼虫草鸟等一切大地上的生命，在当代散文和非虚构创作中独树一帜；陈鹏的作品充满了实验性和形式感，像匕首般敏锐；包倬的创作体现出一种幽默感和对现实敏锐的捕捉能力，能对一闪而过的瞬间迅速进行美学审视和文学升华；诗人胡兴尚和祝立根对七彩云南展开充分的诗意思象，作品特色鲜明。

张庆国的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他曾热衷于先锋写作。他坦言，年轻时总是雄心勃勃，希望写出伟大的作品。不过近几年，他的文学观发生了转变，作品更多地“落在实处”。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犀鸟启示录》获得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研讨会上，张庆国带来《马厩之夜》《如鬼》《黑暗的火车》3篇小说。评论家徐可点评说：张庆国融合了诗

人、小说家和学者的气质，他的写作沉着、用心用情、技巧娴熟。其中，《马厩之夜》是一部指向历史深处和生命本身的文本，在叙述方式上具有很强的个性与探索性。

云南是一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它的地方性与民族性不可分离。彝族作家包倬的作品就有着强烈的地方性。评论家张莉认为，包倬致力于探寻少数民族的精神意志，不回避自身的地方性和少数民族身份；他的作品同时又具有现代性内核，探索超越民族的现代人精神境况。作为家园意象的“阿尼卡”村出现在包倬《双蛇记》《沉默》等许多作品中。“可以说，‘阿尼卡’是包倬的文学之乡。”张莉评价。

与包倬相比，陈鹏离开了“阿尼卡”，离开了西南，他的写作引入了一种世界气象。评论家从治辰读《麋鹿》时，没有想到故事竟然发生在巴黎——一个远离昆明的遥远地方，“这似乎告诉我们一个从昆明出发的作家可以走到世界去”。

## 《启航》：从红色工业中汲取创作养分

本报电（王诗霖）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第一个高潮，涌现出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艾芜的《百炼成钢》等力作；改革开放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浩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三千万》等作品，与时代同行，展现工业改革发展壮阔图景。新时代以来，大飞机、超级电网、核工业、重型装备制造等更为工业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厚写作资源。近年来，中国工人出版社布局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推出《高铁作证》《长辛店》《百年海

上》《中国智造》等作品，又与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联手推出工业历史长篇小说《启航》。该书讲述了主人公李牛从宁波镇海出发，在抗日战争洪流中践行抗战救国、工业报国人生抉择的故事，堪称“一部携有镇海基因的抗战传记、一部怀有东海气魄的工业史诗”。

4月2日，工业文学作家邹元辉携《启航》，亮相北京图书大厦，与嘉宾和读者进行了交流。他说：“我坚信现实主义的力量，工业文学从来都没有在任何时代缺席。只要我们工业文学作家真诚地讲好中国工业故事，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工业文化，并与其共情、共鸣。”



评论家梁鸿鹰评价，《启航》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旋律工业文学创作容易碰到的“公文式陷阱”，把个体成长的心绪，糅合进抗日战争的宏观历史之中，避免了扁平化，是值得肯定的工业文学写作尝试。

从《历程》《涅槃》到近年酝酿的“近现代中国石油化工史诗三部曲”（《启航》《远航》《领航》），作家邹元辉始终从中国工业史特别是红色工业发展历程中汲取创作养分。